

体育文化：作为一种国民共享的人生智慧

黄聚云

摘要：体育文化无论服从“文化强国”还是“体育强国”，无论被当成一种产业或事业，无论采用竞技、教育、休闲还是娱乐等手段，都应当落实到国民的生活世界和生命实践之中，转化成共享的一种人生智慧。制约体育文化的因素不仅来自文化之外，也来自文化的深层——在中国语境之下——主要是社会急剧转型造成的文化失范。要促进体育文化的创新、发展和繁荣，就必须促进体育文化的自觉，这不仅需要批判和反思，也需要对人生的关怀和尊重。

关键词：体育文化；人生哲学；人生智慧；社会转型；文化失范；奥林匹克主义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1207(2012)01-0016-05

Sports Culture —— Wisdom Enjoyed by All the Citizens

HUANG Ju-yun

(Shanghai Institute of P.E., 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 Sports culture should be involved in the citizens' daily life and practice and be turned into wisdom enjoyed by everyone whether it is subordinate to "a cultural power" or "a sports power", or be regarded as an industry or business, or by the means of competition, education, leisure or entertainment. The elements restricting sports culture come not only from the outside, but also from the inside of the culture due to the non-standardization of culture caused by quick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ciety in China.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sports culture, we must promote the consciousness of sports culture. This requires not only criticism and reflection, but also the care and respect to life.

Key words: sports culture; philosophy of life; wisdom; social transformation; non-standardization of culture; Olympism

体育文化是“更好满足人民精神需求、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手段。体育文化建设应“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笔者将这一宏旨解读为一句话：体育文化必须转化成国民共享的一种人生智慧。

所谓“道不远人，远人非道”。体育文化虽包罗万象、体育文化建设也千头万绪，但最终仍要着落到国民的生命实践中，要为提升国民的生命、生活质量服务。体育文化，无论服从“文化强国”还是“体育强国”，无论被当成一种产业或事业，无论采用竞技、教育、休闲还是娱乐等手段，都应力求穿越国家意志、意识形态和利益群体主导的文化外壳，避免打着国家的旗号谋取局部的利益，抵制异化，不对社会生活造成新的压迫。体育文化，如果罔顾人生观、价值观的深层陶冶和终极关怀，忽略国民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逻辑和国民性格改造的历史使命，也就无法转化成普遍享有的文明成果，则无论体育工作如何兴师动众、鼓吹造势，仍然不过是难登文化大雅之堂的“花边一族”而已。

1 从人生智慧角度重新认识体育文化

体育文化是体育这一社会子系统的基本要素，是社会

成员在体育活动中共同建构和分享的思维和行动模式，是体育的知识、技能、价值、信念和体验等的群体建构，也是在长期的体育历史实践中积累而成的精神财富。体育文化与体育实践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它源自体育实践、指导体育实践、并改造体育实践，体育实践的主观升华、群体认同、历史沉淀就构成体育文化。体育实践是与人的生命活动、生命体验和生命历程最直接相关的领域之一，所以，体育文化历来都是满足人的身心需求、塑造完备的素质、促成健康美好人生的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和精神力量。在古今中外关于人生智慧和理想人生的论述中随处可见体育文化（或体育）的身影。在古希腊，苏格拉底就说：“学习高尚和美好的事情，研究那些能使人维护好自己的身体、治理好自己的家庭、有益于朋友和城邦，并且有制服敌人的本领——这一切不仅有益，而且还能产生最大的快乐”^[2]。这里所说的本领主要是体育素养，苏格拉底对体育素养的重视甚至达到了做人基本尊严的地步。在近现代，奥运会之父顾拜旦在充分吸取古希腊体育文化精髓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奥林匹克主义”。按照顾拜旦的观点，奥林匹克主义不是组织形式意义上的体系，而是要体现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道德精神态度^[3]。以顾拜旦的论述为底本，融合诸多奥林匹克思想家和实务家理论贡献的《奥林匹克宪章》则明文规定：“奥林匹克主义是提升身体、意志和精神的品质并将其组合成均衡整体的人

收稿日期：2011-12-27

基金项目：2012年度上海市体育局决策咨询课题

作者简介：黄聚云，男，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体育社会学。

作者单位：上海体育学院 体育理论教研室，上海 200438



生哲学。奥林匹克主义将体育运动与文化、教育相融合,谋求创造一种以奋斗中的乐趣、良好榜样的教育价值、社会责任和对普遍性基本伦理原则的尊重为基础的生活方式。”^[4]奥林匹克运动,无论在其希腊源头上,还是当代全球化背景下,都是规模最为宏大的体育文化形式,没有其他任何一种体育文化形式能在影响力上、组织化水平上和效益上与之相提并论。而这一宏伟的体育文化形式是将奥林匹克主义——一种刚健的人生哲学——奉为核心信条的。而奥林匹克运动能够在百余年时间里崛起为“文化巨人”,并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所秉持的体育运动与文化、教育等融合并内化到人生实践中的思想和信念。

在我国,任何精神文化包括体育文化都与安身立命之学浑然一体。在先秦时期盛行的“六艺”教育中“射”、“御”和“乐”皆富含体育的文化元素,这些都是当时士君子应掌握的基本人生素养和技能。自汉朝起,佛道两家养生文化蓬勃兴起,按照道家养生大师萧天石的观点,养生学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仅指“寿命学”,广义是指“人生修养学”。“凡人之所以为人,与人之如何完成其人生意义、高尚其人生价值、圣化其人生境界之道,无不赅焉。人而欲美化其人生,使其有以异于禽兽,有以超凡俗而入于圣真之域,能极高明而博大,极悠久而无疆,便不能不讲究人生修养。此即是吾人所标‘养生学’之事矣。”^[5]可见,养生学就是一门关于人生智慧的学问,以“五禽戏”、“八段锦”、“太极拳”等为代表的体育养生是中国传统养生文化中极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它讲究“形神兼备、内外兼修、动静结合、以德为先”,具有祛病强身、延年益寿、养情怡性等多种功效。

进入当代社会以后,体育文化出现一股强调“服务全民”、“以人为本”、“融入生活”的进步国际潮流。这一潮流也被中国社会洞悉,并开始体现在近年来出台的各种方针政策之中。在《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服务民生。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把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体育需求,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做到体育发展为了人民,体育发展依靠人民,体育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体育文化建设方面,《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要求:“深入挖掘体育的文化内涵,夯实体育发展的社会基础和文化根基,提升中国体育的软实力。通过体育促进建立健康、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塑造积极、健康的社会价值观和大众人生观。充分发挥体育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作用和功能,让体育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播者和创造者,成为时代精神的倡导者和先行者。”^[6]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国家意志的立意之中体育文化被提升至——或者说是回归到——国民共享的、完善人生的文明成果的境界。然而这一立意与实践之间还存在很大的落差。特别是对于体育文化向国民共享的人生智慧转化中的障碍和困境还缺乏理性反思。正如有些学者所说的:“当今体育之所以不能获得理想的效果,最大的弊端在于体育过程中对生命本身关注不足,忽视生命表达的多样性”,它导致运动员“无暇欣赏自然生命之花的美丽,只能强迫自己成为胜利符号的奴隶”;学生活泼的个性被瞬间抑制;威胁生命健康的疾病反

倒成为推动全民健身运动发展的“实效力量”。“如何从体育、生命、赏识的关系出发,更好地理解体育的本质内涵,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7]

2 体育文化对人生智慧的背离

2.1 竞技体育文化——奥林匹克运动的异化

顾拜旦曾经说过:“奥林匹克主义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宗教,他在促进健康和热心公益的基础上,围绕技艺与思想,通过富有阳刚之气的运动实践发展一种强有力的教育。”^[8]

顾拜旦关于奥林匹克主义的宗教观并不仅仅是一种“神圣”的比喻,而是一种割舍不去的追求崇高和救世的“情结”,顾拜旦深知,奥林匹克运动只有与宗教等最被看重的精神文化领域“亲和”,扎根人类灵魂的最深处,才有可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和普遍的认同度。在顾拜旦的理想当中,奥林匹克运动不是人类文化生活的“开胃菜”或“调味品”,而是丰盛的“经典正餐”。为此,他想方设法、殚精竭虑,不仅歌颂体育,还鼓励文学艺术,申明业余和非盈利原则,甚至不惜搬出“骑士精神”。正如顾拜旦拥有男爵贵族身份那样,他穷其一生倡导的奥林匹克主义也具有浓烈的传统精英文化的气质。这种传统精英文化在日益理性化、大众化、消费化的现代背景之下,就像“阳春白雪”遭遇了“下里巴人”的听众一样,不免有些曲高和寡、不合时宜。在北京奥运会“无与伦比”的竞技成就和场面气派之耀眼光芒下,遮蔽的是世人对奥林匹克人生哲学的淡忘与曲解。试问:有多少当代奥运明星懂得文学、艺术?有多少谙熟哲学、历史?有多少保持诚实、公正?又有多少信守骑士精神和人道主义?奥运选手们经年累月、含辛茹苦地训练着少数被严格规制且并无任何实际用途的运动技巧,除了金牌的象征意义和随之而来的巨大利益之外,还能有多少“合理化”的动机和值得称道的价值?尤其是当这种高度“专门化”的活动是建立在消耗公共资源的基础之上的时候。“为国争光”这一无可辩驳的“神圣话语”茹纳了多少“假国家之名行部门或个人之实”的行径?光鲜靓丽的竞技场之下包藏了多少买分卖分、幕后交易、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和假球黑哨的勾当?健美的身姿掩饰了多少对科技、药物的过分依赖和在文化修养上的贫乏?

奥林匹克运动发展至今,无论在精神还是技术上都已经高度异化了^[9, 10],在奥林匹克主义与奥林匹克实践之间出现了不断加大的裂痕。这当然不能归咎于顾拜旦——奥林匹克主义仍然是矫正这个时代很多弊病的“灵丹妙药”——而是奥林匹克文化当代演进的深层逻辑出现了悖论:奥林匹克主义的精髓在于它是一种刚健而富于包容性的人生哲学,其推行和发扬应当建立在感召、熏陶、涵育、信奉的基础上,并通过大量个体的自觉、自愿、自主的自组织形式来践行和发扬;然而为了在复杂环境下获得更强的竞争力、更多的参与者,奥林匹克被迫采用了一种逐利的、强迫的、制度化的、国家行为的、群众运动的、他组织的扩张模式,导致在信念逻辑与生存逻辑间产生了无法消解的矛盾。

以奥林匹克运动为中心的竞技体育文化出现广泛的问题和弊端。在我国,这些弊端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①对奥运竞技片面重视导致对学校体育、社会体育乃至非奥运竞技的相对剥夺,这是违背“人本”、“民本”、“民生”



等基本发展理念的。②竞技体育领域层出不穷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假球黑哨、幕后交易、徇私舞弊、买分卖分、赛场暴力、违禁药物、涉毒涉黑现象严重地伤害了人民群众的感情、败坏了国家的形象。③竞技体育从业者的重体轻文、片面发展不仅对自己的生命历程、人生命运是一种扭曲，对其他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少年也无法树立良好的榜样。当考虑到四处泛滥着的锦标主义、拜金主义和根深蒂固的“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个人意志部门化、部门意志国家化”弊端的时候，可以说，我国的竞技体育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沦为一种供非人格的文化主体（国家、财团、部门、协会、媒体、粉丝群等）赏玩的“社会景观”。

2.2 学校体育文化——处在夹缝中的“健商”与“体商”

近代思想家洛克在其名著《教育漫话》中开篇第一句即道出了“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体，这是对于人世幸福的一种简短而充分的描绘”的至理名言^[11]。“身心和谐，全面发展”是自古至今一切广受推崇的教育理念和模式的总纲。任何教育理念和模式都孜孜以求的目的是将“合理”的文化内化到受教育者的生命体验和实践中去。所以，教育是实现文化向人生智慧转化的重要途径。由教育语境下的人生智慧自然而然会联想到“智力”、“能力”、“智商”等个体品质。当代教育早已超出单纯智力教育的范畴，表现在度量个体人生智慧水平的指标已经包罗了更加广泛的内容，如：“智商”、“情商”、“财商”、“德商”、“健商”和“体商”等。“智商”评价应用的历史最为悠久；“情商”概念在传入奉行“三分能力，七分关系”的中国文化场域之后，立即受到大力追捧；“德商”的理念在一个高度个体化和道德沦丧的时代有着强烈的针对性，但其学术研究和实际应用的热度均十分有限；“财商”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对金钱财富的追求获得空前高涨的“话语合理性”之后才在中文语境广泛传播的一个实用性追求远大于其学术价值的概念；而“健商”、“体商”与体育文化的关联最为密切，其理念的形成与传播要归功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确立和体育、健康学科群的贡献。

1993年布莱德·鲍曼提出了“健康商数”的概念。2001年，加拿大籍华人谢华真教授所著的《Health Quotient》一书在加拿大出版发行，使“健商”一词风行学界。“健商”的五大要素是自我保健、健康知识、生活方式、精神健康和技能。“健商”理念最重要的一点是自我保健，即每个人要对自己的健康状况负责，而不是把一切都交给“专家”，要把健康的权利与责任回归人类自身^[12]。

与“健商”含义极为接近的另一个概念是“体商”。从笔者目前掌握的文献来看，“体商”有3种代表性的解释：①将“体商”理解成“body quotient”，即人对自身真实健康情况自我认识的反映，采用类似问卷、量表的方法进行测量。较早见于迈克尔·罗伊森和迈哈迈特·奥兹的畅销书《YOU：身体使用手册》^[13]。②将“体商”理解成“physical quotient”，即一个人的活动、运动、体力劳动能力和质量的量化标准，需要测定力量、速度、耐力、速度耐力、平衡能力、定向能力、柔韧性、协调性、灵活性和适应性10大方面指标^[14]，这一观点可能是我国体育界的自创。③将“体商”理解成“sport quotient”，即对体育

锻炼的热心程度以及参与运动的水平，认为：孩子参与锻炼越早，“体商”的提高往往也越快，长大后更可能成为体育爱好者，或运动水平较高的“体育能人”^[15]。无论“健商”还是“体商”，都是一种深深地扎根于文化背景的概念，内蕴了不同文化的竞争与调和，和个体生命对外在文化的内化、调适的复杂而微妙的过程，需要借助厚实的科学文化功底才能培育。所以，提升学生“健商”、“体商”的工作实质上也是合理的健康知识、体育文化的普及运动和国民性格的改造过程。

“健商”、“体商”的概念自传入中国起，就受到广泛的关注和欢迎。在过去的十年间，医学界、教育界和体育界都有不少学者撰文论述，体育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个视角：如何运用“健商”、“体商”这样的新理念指导和促进体育教育教学改革。在这一点上聚焦并非偶然，而是刚好迎合了中国学校教育“健康第一”的转向和步调所致。按照有些学者的观点，“现代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把教育与人的生命发展联系在一起。作为人的生命发展形态的体魄健康、人格建树和智慧能力的生成无疑成了现代教育所追求的最终目标，提高人的生命质量无疑成了教育的本质属性。体育教育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思想，必须要使每一个学生都了解必要的健康知识、掌握保持健康的技能和行为，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16]

然而这些新的文化理念并未能顺利地转化成学生的个体素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学校教育中的形式主义在作祟。许多学校体育和健康教育的元素是作为上级下压的工作任务而存在着的，通常是“检查的时候有，不检查就没有”。例如：阳光体育运动中的形式主义现象。正如有学者所说的那样：“有很多地区阳光体育在实施的开始阶段，就是为了迎合上级领导部门的检查，对于部分筹办的阳光体育运动进行大肆地造势，极力地渲染，过分地夸大了其举办地阳光体育运动。而上级检查过后，阳光体育运动就被踢进了角落，学校、社区的各种活动又恢复了以往的模样。这种‘形式主义’的作为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存在着，随着阳光体育口号提出时间的延长，这种‘形式主义’的作为也就体现得更严重。”^[17]还有学者通过调查发现阳光体育存在3个方面的形式主义倾向：阳光体育“口号化”；阳光体育内容“形式化”；阳光体育实施“理想化”。在很多学校，阳光体育运动是通过组织中长跑的形式来实施的，大部分学生对以中长跑的方式来锻炼身体持否定态度。他们之所以参加主要归因于学校领导、教师的监督，他们是勉强配合、带着情绪、被动参与的，无法从中感受到体育健身带来的乐趣，这也是限制阳光体育推广和长期发展的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18]。青少年学生“被健身”现象的广泛存在充分表明了学校体育文化在向学生人生智慧转化时的扭曲。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教育阵地的争夺战中，参与角逐的除了“健商—体商”这队同盟军外，还有实力雄厚的“智商”和声势浩大的“情商”等力量。现有的教育实践一直更加偏爱各“商”之中的“智商”；近年来随着“培养学生的积极情感体验”等理念的推行，“情商”在成为“新宠”；而“健商—体商”——尽管有“健康第一”的尚方宝剑——客观上却仍然被忽略、被冷落。在以“教育价值消费化”、“教育环境温室化”、“教育手



段轻快化”、“教师职业女性化”等为表征的教育柔性化的大背景之下，学校教育沦为各种不利于学生体质与健康因素的一种生成机制^[19]。在“智商”、“情商”与“健商一体商”之间似乎出现了一种结构性的矛盾，“健商一体商”成了发展“智商”和“情商”必须要付出的成本：“应试教育”倚重的是“智商”，“素质教育”宠溺的是“情商”，唯独“健商一体商”属于两头不沾的“庶出弃儿”，只有当国家意志和公众舆论的“探照灯”将其纳入视野之中的时候才会受到学校教育的应付性的“垂青”。生长在“应试教育”和由时新教育理念主导的所谓“素质教育”的夹缝中的青少年，会适应性地“进化”出一种反“健商一体商”的生活模式。这一点，恐怕是广大的教育和体育工作者不曾预料的。“健商一体商”对青少年而言，或许只不过是他们所遭遇的众多时新教育理念和评估指标中并不显眼的一类而已，他们在教育的迫力之下能够熟记许多健康和体育知识，但是这些知识很难在他们那已被分数编码和泛娱乐化的生命体验中激起令人震撼的波浪，也就很难被践行。

青少年的体质与健康关系到社会的活力、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未来，从过去数十年的各种数据资料来看，青少年的体质与健康指标出现了持续下滑的态势，自2006年后，大量有力措施出台，情况有所好转。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2010年全国第六次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显示“形态发育水平继续提高”、“肺活量水平出现上升拐点”、“营养状况继续改善”、“乡村小学生蛔虫感染率持续降低”、“中小学生身体素质下滑趋势开始得到遏制”，但同时也存在“大学生身体素质继续呈现缓慢下降”、“视力不良检出率继续上升，并出现低龄化倾向”、“肥胖检出率继续增加”、“龋齿患病率出现反弹”等问题^[20]。鉴于上述调研结果有喜有忧，且没有涉及心理和行为指标——而这是近年来青少年人群健康问题高发的领域——所以，无法从这一报告中得出太过乐观的结论，学生体质与健康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紧迫性并未消减。按照《青少年体育“十二五”规划》中的论断：“青少年体育依然整体薄弱，青少年体育工作在建设体育强国中的基础性战略地位有待进一步加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 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的各项措施有待进一步落实；青少年体质下降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全社会关心、支持青少年体育的氛围尚未形成，对青少年全面发展缺乏足够的重视。”同时，“片面追求升学率、应试教育等多种问题带来的影响是青少年体育工作面临的一项长期性挑战。青少年多元化体育需求和价值取向给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21]从“健商一体商”和体育文化修养的角度而言，青少年学生仍然是薄弱群体。

2.3 社会体育文化——陷入群体非理性困境的大众养生和健身

中国人可能是世界上最关注养生的民族，浩如烟海的养生著作、纷繁驳杂的养生流派、数不胜数的养生名家，在数千年的历史堆叠之下，变成了现代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矿藏。这一文化矿藏在国民的健康需求日趋增强和老年人口不断膨胀的大背景之下，变得身价倍增、无比诱人，并促发了一股持续至今的养生文化淘金热。这股热潮从气功开始，后成为伪科学和邪教汇聚滋生的暗流：“现代济公”严新、香功田瑞生、自然中心功张香玉、慧莲

功陈林峰、智能功庞鸣、雪域奇人玉奇、金菩提狄玉明、人体科技沈昌、万法归一功张小平和引发浩天之劫的法轮功李洪志等所谓“气功大师”纷纷粉墨登场，或念咒施术或发放“外气”^[22]，上演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神秘主义文化运动”^[23]。

政治意义上的污名化令伪气功丧失了公开传播的话语空间，然而与其存在家族相似性的其他事物又在新的未被有效规制的社会生活领域中繁殖蔓延。在体育、卫生和文化事业等接壤的“三不管地带”，各种各样的养生术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见缝插针地抢占着体制化资源尚未覆盖、专业化服务不屑顾及的空隙，并假借大众传媒的“东风”，在消费主义、娱乐化社会和粉丝时代交织而成的“大气候”下，迅速地营造出一种“忽悠你没商量”的畸形文化生态。在这种急剧变异的畸形文化生态里，养生文化与消费主义、大众娱乐、商业利益等杂交后繁殖出的谬种四处流传，最终围拢成一个鱼龙混杂、是非难辨的名利场。伪养生大师们以比其“前辈”——伪气功大师们——要快得多的生命周期涌现和消亡着，颇有一种“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势头。屡禁不止、此起彼伏，似乎成了伪养生文化的一种常态。一方面社会各界的批评、指责、质问之声不绝于耳，另一方面又“走了强盗来了贼”，“过气”的“大师”们的帝国尚未完全倾覆，“新秀”们就已崭露头角抢夺“江湖地位”。走马灯式的代谢沉浮不仅扰乱了视听，更糟糕的是，它会伤害群众的身心健康、社会情感和切身利益。

与“养生热”的乱相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民健身热”的高度的“有序”，在电视台、报纸、网络等各种媒体中，“全民健身”几乎都是以排列整齐的健身方阵出现的，千人会师、万人做操，群众被某种强力整合到一起之后似乎拥有了可以无限激发的“积极性”。在政府的统计报告、部门的工作规划和学术界的论文中充斥着对大型群体活动的热衷和设想。数量和规模上的直观优势远远盖过了内在的持续效益；轰动效应、视听上的冲击感、政治意义上的成就构成了优先目标；制造和驾驭宏大社会场景的欲望超越了管理岗位而泛化到各种角色群体当中。在这样的工作视野下，普通国民成了千人一面、没有面目、被拉平了的个体，唯有结成合乎行政意志的规模化群体才能获得意义、受到重视。像这样基于系统世界而非生活世界的需要、倚重政绩价值而非生命价值的“军团式”健身文化属于另一种形式的群体非理性。

国民的养生、健身生活并非纯粹的个体活动，而是在政府、传媒、学校和社会团体等公共生活介质的影响之下开展的，因而具有了群体心理学的特征。按照群体心理学的开拓者古斯塔夫·勒庞的观点，“群体几乎完全受无意识动机的支配，与理性或智慧无关”，“群体永远漫游在无意识的领地，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表现出对理性的影响无动于衷的生物所特有的激情。他们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除极端轻信之外再无别的可能。”^[24]群体固有的无意识属性使其沦为由多个个体构成的、几乎不能达成任何理性决策和行动的“乌合之众”，这也正是“伪养生”、“军团式健身”等现象叠出的重要原因。但是，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自组织理论启示我们，群体完全有可能形成高度自主、和谐的行动力量。体育是自组织系统较易形成的领域，但同时也是各种群体非理性现象的温床，体



育的这种矛盾的面貌，并非仅由体育群体固有的非理性品质所致，更因为社会文化模式出现了问题。

3 综合与引申

一系列来自文化深层的因素对体育文化的人生内化起到了消极作用，在中国的语境下，这些因素可以概括为由于急剧的社会转型造成的文化失范。

(1) 这种失范首先是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分离。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遵循着不同的游戏规则：实质合理性的评判注重“价值正当性”和实效，形式合理性的评判注重“话语合理性”和方法。一种被认为具有实质合理性的体育文化应当具备如下特征：它的确起到了增强体质与健康的效果；它符合人与社会、自然和谐等基本原则。而官方的认可、媒体的赞扬、学界的支持、群众的认同，只能表明形式合理性。实质合理性的评判需要漫长的时间周期，追求实质合理性意味着较高的成本和遥不可期的回报；而形式合理性的评判简便易行，追求形式合理性就可以有的放矢、成绩指日可待。这样一种显而易见的博弈情景导致各种只具有形式合理性而缺乏实质合理性的体育文化的“谬种流传”，成为国民人生麻烦和悲剧的制造者。

(2) 在转型的洪流中，“改革”、“创新”成为各种社会事业的基本态势和广大社会成员的共识，不仅国家领导人，甚至连小学生和幼儿园小朋友都在有组织、有系统地学习、领会着个中的“思想精髓”。这造就了一种全局性的社会心态，即对现状的延续不做任何持久的预期，因为决定现状的政策性、制度性因素随时有调整的可能；对现状中的问题和弊端——只要不关系到自身利益——也不必采取过激的态度，因为对策迟早要出台，而新的问题和弊端又总是不断在出现。变动性的因素紧紧地缠绕着每一个现代人的生命实践，而对变动的控制又远超出个体能够把握的边界，构成一种难以改变的大环境制约力量，两者合谋，肆意地涂改着普通成员的人生脚本。这导致一种只想“活在当下”的生活策略的盛行，并通过各种急功近利的体育行为表现出来。

(3) 在中国传统背景下，几乎各种与人生有关的思想文化的精髓都在于：它们认为生命并不仅仅由“身”和“心”构成，还包括了更加重要的一个元素：“性”（是“本性”的“性”，不是“性爱”的“性”）。“性”代表了道、宇宙本源、生命的本真、先天的禀赋、超自然因素的个体寄托、社会价值体系的缩影。“性”统御着“身”和“心”，正是因为有“性”的主宰，所以，无论身体如何颠沛流离、心理如何辛酸痛苦，人生终不至于迷乱、生命终不至于堕落。然而，近现代社会的到来剥离了“性”赖以存在的文化土壤，宗教去魅了，泛灵论破灭了，生命的元素只剩下了终将败亡的身体和永不知足的心理，人生的哲学化约成了身体与心理的“罗曼史”。无论二者谁主沉浮，人生注定无法获得归宿，生命注定陷入茫然。为了弥补“性”的失落引发的文化危机，人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替代品——现代体育文化就是其一——但它们都经不起来自身体或心理任何一方的欲望的冲击。所以，以迎合欲望为杀手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可以轻而易举地战胜道德伦理、法律法规、人格品质。

(4) 古今中外各种维护生命状态健康完好的智慧都建

立在一些普遍认可的原则之上，例如：身与心的和谐，刚与柔的统一，等等。而其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伦理原则：对欲望的节制。然而现代人的精神世界早已被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殖民，特别是青少年正处在生命力旺盛、张扬欲望、盲目模仿的时期，如果没有一种强有力的外在控制手段——就像古代斯巴达人所做的那样——他们就很难接受一种制欲的思想理念，更遑论践行。只要回顾一下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到处充斥着的对“卫道士”和“苦行僧”们“伪君子”、“假正经”等污名化地描写、刻画，和当代影视剧及各种电视娱乐节目中对金钱、“情爱”和“情调”泛滥成灾地高调赞颂，就可以感受到这种对制欲主义的强烈的逆反心理。国民体育文化的践行也是不同的文化模式在个体生命实践中的争夺较量：主张顺欲、纵欲的一方得到了传媒、资本和时新理念的源源不断的声援和支持，而主张节制的另一方则常常陷入孤军奋战的困境。这场力量悬殊的文化战争的走向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先进的技术设施和多样化体育手段的介入可以使指标呈现“止跌”甚至“上升”态势，但在文化意义上的“被动”似乎已成定局。国民获得的是一种忽视节制伦理的“体质”与“健康”，是一种缺乏内生价值、并且建立在大量的社会资源消耗基础上的“素质”。当国民高呼“我宁肯作一个酒色之徒，而不愿作一个圣者”的时候，千万别以为他们像尼采一样沉醉于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哲学境界中，其真正皈依的是毫无哲学深度和美学意境的赤裸裸的拜物宗教。

(5) 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犹如一场气候剧变，造就了一片生态失衡的文化空间。这片空间更有利于那些不需要根基的文化物种（例如消费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繁殖。在这片空间里存在着大量的蛮荒和异变的地带，在这些地带里，一切都用物的尺度进行衡量，一切活物都像弗洛伊德说的“本我”一样遵循“唯乐原则”，不需要凌驾于个体之上的神圣法则，不需要对身体、心理的欲望进行过多的约束。生活在这种地带的人们喜欢利益胜过道德，喜欢美丽胜过真理，喜欢个性胜过理性；他们用健康来换取快感、用生命来换取金钱，由身体来统治灵魂、由物欲来养育习惯。这种地带是“瘾君子”的乐园、“卫道士”的绝境，是“青春偶像”的秀场、“古板学究”的墓地，是“娱乐达人”的沙龙、“精神贵族”的囚室。它如佛教所说的末法时代般几乎无可救药，又像好莱坞大片里所呈现的未来世界似的无所不能，还像社会学大师韦伯所描述的“铁牢笼”那样令人无可奈何。正是在那里，体育文化异化成了一种扰乱、宰制其属民生命、生活的精神力量。

4 结语

贯穿于竞技体育、学校体育、社会体育，乃至一切宏大社会生活领域的一条最基本的线索是人的生命体验。任何宏观的社会事业、文化成就，都是由这些微观的、鲜活的生命体验所铸就。文化的生命力流淌在个体的血液里，体育文化亦不例外。体育文化的创新、发展和繁荣，应该建立在张扬生命活力的基础上，这种张扬不是尼采的“贵族老爷”式的，但也不是民粹主义的，而是多元包容的。在体育文化与生命之间应当是如下的关系：体育文化丰富生命的体验、提高生命的质量、造就生命的传奇；而非生命是体育文化的成本、注脚、工具和对象。体育文化应当转化成一种人生的智



慧、充满活力的生活方式，而非停留于生活的点缀，更加不应当沦为人生迷乱和悲剧的制造者。要实现上述转化的关键在于体育文化的自觉，而体育文化自觉的关键在于批判和反思。

当今的中国已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综合实力强国，中华民族正在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昂首迈进，国民素质不断提升，国民的社会形象也今非昔比；但与此同时，国民的科学文化修养还很薄弱，精神文化需求在不断增强，面临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环境也更为复杂。体育文化获得了更好的发展空间，但也会遭遇更多的迷茫和歧路。尤其是“高歌猛进”的豪情加上变革社会的热烈，会冲刷掉涉及大众福祉时“如履薄冰”的谨慎——倘若那些能够改变成千上万社会成员人生命运的决策是少数掌握话语权的人未经充分论证就上升成国家意志的话，那其所造成的负面效应绝对会比正面的更多。对于当代语境下的体育文化——这个至今都尚未真正进入国人生命深处的领域——而言，采取一种他组织的、群众运动的、缺乏理性反思的策略固然可以取得一些显而易见的成就，但无形之中会使自身更加远离人生智慧和一直向往的文化殿堂。

参考文献：

- [1] 人民日报重要报道汇编编辑组. 学习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人民日报重要报道汇编[Z].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8
- [2] [古希腊]色诺芬. 回忆苏格拉底[M]. 吴永泉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7：172
- [3] 王润斌杨麟, 熊晓正. 奥林匹克主义的历史哲学审视——兼评迪卡娅·凯泽斯塔提乌的“当代奥林匹克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变迁”[J]. 体育科学, 2011 (8): 3-19
- [4]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2011). Olympic Charter[Z]. Lausanne Switzerland: DidWeDo S.à.r.l., July: 10
- [5] 萧天石. 道家养生学概要[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4：8
- [6] 国家体育总局. 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EB/OL]. 国家体育总局官方网站，2011-04-01，<http://www.sport.gov.cn/n16/n1077/n1467/n1843577/1843747.html>.
- [7] 富学新, 安丽娜. 赏识生命文化——对体育的新解读[J]. 体育文化导刊, 2007 (12): 29-31
- [8] 熊斗寅. 时代的召唤 历史的必然——读顾拜旦《现代奥林匹克主义的哲学基础》[J]. 体育文化导刊, 2011 (2): 149-154
- [9] 甄媛圆. 奥林匹克运动中技术异化问题研究[D]. 上海体育学院, 体育人文社会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 2010
- [10] 余蓉晖, 孙葆丽, 申伟华. 论奥林匹克道德教育功能的弱化和异化现象[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07(10): 1311-1312
- [11] [英]洛克. 教育漫话[M]. 傅任敢 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 1：1
- [12] 丁郭平. 健商的研究进展[J]. 护理实践与研究, 2011(3): 94-95
- [13] 李汉武. 体商(BQ)及其测量评估[J]. 中国热带医学, 2006(12): 2278-2281
- [14] 熊有正, 杨揭式. 体商[J]. 中国运动医学杂志, 1997(1): 76
- [15] 刘坚. 注重提高孩子“体商”[N]. 科学导报, 2005-02-27 (B08)
- [16] 浦松泉, 马俊. 提高学生“健商”——体育教改的一个新课题[J]. 上海体育科研, 2003(2): 72-73
- [17] 朱维君. 莫让“阳光体育”沦为“形式主义”的牺牲品[EB/OL]. 浙江中小学教师(学科)专业发展培训网站, 2011-11-21, <http://zxxjs.zhejiang.teacher.com.cn/GuoPeiAdmin/TeachingIntrospection/TeachingIntrospectionView.aspx?TiID=17274>.
- [18] 张辉, 徐英微. 论现行“阳光体育”实施中的形式主义倾向及其系统应对策略[J].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 2009(4): 106-111
- [19] 黄聚云. 教育柔性化与学生体质健康问题[C]. 2011 第九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 2011-12-07
- [20] 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 2010 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EB/OL]. 国家体育总局网站, 2011-09-02, <http://www.sport.gov.cn/n16/n1077/n297454/2052573.html>
- [21] 国家体育总局. 青少年体育“十二五”规划[EB/OL]. 国家体育总局官方网站, 2011-04-19, <http://www.sport.gov.cn/n16/n33193/n33208/n1581724/n1581769/1887594.html>
- [22] 夏劲, 罗晰. 试论伪科学的实质、成因与防治对策[J].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5): 437-440
- [23] 涂建华. 特异功能 20 年历程及其特点[J]. 湖南城市学院学报, 2009 (4): 14-19
- [24] [法]古斯塔夫·勒庞.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研究[M]. 杨程程 译, 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10. 12：8-32

(责任编辑：陈建萍)